

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

1840 ~ 1949

包伟民 / 主编



知识出版社

包伟民 主编

江南
市镇
及其
近代命运 1840 ~ 1949

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明秀
责任校对:胡 蓉
封面设计:童行侃
责任印制:童行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包伟民主编. -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2

ISBN 7-5015-1624-3

I. 江… II. 包… III. 城市史-研究-中国-1840~1949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371 号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283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5.00 元

卷首语

当本书的写作最后完成的时候,我在轻松、高兴之余,又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任何一本学术著作的完成,都不可能只是著作署名者的功劳,这本《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尤其如此。诚然,学术研究的每一个进步,都不免以前人的学术积累为基础,而在此之外,由于本书论题的特殊性所致,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师长、友人及有关学术机构的资助、支持与鼓励,以时风观之,实在近于异乎寻常。我担心因学识所限,我们的最终成果难符师友的期望,这就是我为什么感到不安的原因。也因此,我要在本书的开卷之页首先写上我们对这些帮助的感激之意。

说到本书论题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有关“近代江南市镇”这个题目的资料过于缺乏、过于分散,尤其当我们希望尽量贴近它的基层社会生活时更是如此。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依靠有关的图书资料机构。从国家的北京图书馆,到江、浙两省有关大学和省、市、县以及部分市镇的图书、档案机构,都曾为我们提供过难得的帮助。另一方面,我们还对大约十几个市镇进行了实地社会调查,以弥补文献资料之不足。在这方面,我们曾遇到过不少困难,但铭记在我们心中的却是那些认识与不认识的友人的热忱与真情。我们在这里无法将这些友人的姓名一一罗列出来,只要提起下面两个事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1994年11月初,我们在去昆山周庄镇的客车上,遇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姓王的先生,他不仅热心地向我们介绍有关周庄的情况,而且当得知我们希望得到一本

周庄的镇志时，下车后，他立即到家里取来一本新编《周庄镇志》送给我们，并坚决拒绝了我们付给他的书款；去年的一天，老同学周勤风尘仆仆从海盐专程赶到杭州，为的就是给我送两本当地新编的地方志！

正由于这种多方面寻集资料的需要，本书研究的完成也有赖于有关机构所提供的可贵的学术资助。在这方面，美国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董事会）所提供的研究资助是基础性的。此外，杭州大学董氏学术基金委员会及历史系所提供的资助，是本书得以顺利出版的前提。记得 1993 年夏季，当本书的计划还在构思之初，台湾清华大学张元教授为了帮助我们争取到有关机构的资助，千里迢迢来到浙江，冒着酷暑，自费与我们一起到几个市镇进行前期调查，以获取必要的课题论证材料。在本书写作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们一直把这种情意看作是激励自己坚持研究下去的重要动力。我在这里代表本书所有的作者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本书是一个课题小组集体研究的成果，不少学者虽未参加最后的写作，但在多次的论证讨论中，曾对课题的研究提出过具有启发性的意见，所以本书如果有些许学术成果可言的话，是包含了这些学者的贡献在内的。

本书写作具体分工如下：包伟民负责全书的构思与总撰稿，其余有关各章撰稿人员有：第二章严建强，第四章周生春，第五、六章郎友兴，第七章陈晓燕，第八章包伟民、周谷平。

最后，我们要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

包伟民

1997. 10. 31

目 录

卷首语	(1)
绪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关于理论工具	(7)
三、基本命题、学科方法、资料概要	(13)
四、本书各章节所涉及的基本问题	(21)
<hr/>	
第一章 现代化早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变迁	(30)
一、传统江南市镇的基本格局	(32)
二、国门洞开及其对江南市镇的阶段性影响	(46)
三、结语	(71)
<hr/>	
第二章 近代江南市镇镇区形制特征概说	(92)
一、形制特点	(93)
二、街区模式	(98)
三、交通 街市 防御	(102)

第三章	近代交通引进及其对江南市镇的影响	(111)
一、	近代交通引入及其影响:铁路	(114)
二、	近代交通引入及其影响:公路	(122)
三、	近代交通引入及其影响:轮船	(126)
四、	货运与客运:结语	(140)

第四章	近代江南棉业与市镇的兴衰	(160)
一、	近代前夕江南棉业与市镇概述	(160)
二、	植棉区的扩大及其影响	(165)
三、	棉纺业的变迁	(173)
四、	棉织业的变迁	(177)
五、	市镇存在与发展的新境遇	(182)

第五章	近代江南市镇社会结构的嬗变	(193)
一、	对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研究的若干说明	(193)
二、	职业与阶层结构	(195)
三、	家庭结构	(201)
四、	社会组织	(206)

第六章	近代江南市镇的社会生活及其变迁	(229)
一、	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	(230)
二、	社会习俗的嬗变	(246)
三、	社会价值观念的衍变	(251)

第七章	近代江南市镇人口与城镇化水平	(264)
一、	两种类型	(266)
二、	人口变迁	(277)

第八章	关于市镇在近代文化传播中的地位	
——	以蚕桑改良运动为例	(291)
一、	近代蚕桑改良运动兴起的原因	(292)
二、	蚕桑改良运动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	(297)
三、	蚕桑新技术在农村推广与市镇在其中的地位	(306)

结 论	(322)
附 录	(329)
抗战前南浔镇手工业统计表		(329)
抗战前南浔镇商业统计表		(330)
1930 年吴兴县练市镇工商业统计表		(331)
1948 年乌(青)镇商业、饮服业户数、人数表		(333)
1947 年萧山县浦沿镇街市商店分布图		(334)
引书目录	(335)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本书研究的是中国江南农村地区市镇在近代(1840~1949)时期的变迁问题。

近年来,关于农村市镇的研究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这是由学术发展的趋势与中国国内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在国际学术界,最先研究中国市镇史者当推日本学者加藤繁。20世纪30年代初,加藤繁在从事对中国唐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工作中,注意到了当时都市形态的变化,并由一般都市论及乡村商业聚落即市镇的发展。其他一些日本学者后来也曾加入到这一研究过程中。^①自五六十年代起,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除王朝政治与学术思想之外,开始比较多地注意整个社会状况的演变发展,例如人口增长、社会结构等等,其中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历史上的城镇化过程问题。^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地理学家 W. 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早于30年代提出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在被冷落了数十年后,开始对城市地理学产生革命性影响,并辐射到其他学科。到60年代中期,美国人类文化学教授 W. G. 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r)借用这一理论,完成《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

会结构》一文,连载于美国《亚洲研究杂志》^③,以区域研究的角度,论述了从明清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农村市场结构的演变发展,由此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城镇化过程,影响颇大,从而在学术界开启了一个关于农村市镇的专门研究领域。70年代,美国学术界制订了一个关于研究中国城镇化问题的计划,集中力量编撰了三本关于中国城市问题的论文集,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关于市镇问题的讨论。^④西方学术界的这些研究,主要来自于施坚雅的工作。施坚雅在市场结构、区域特征、理论工具等方面,确立了关于中国市镇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从而为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

自70年代起,台湾学者刘石吉连续发表长篇文章,集中论述了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关于中国市镇的发展问题在日本学术界也逐渐成为一个共同关心的论题,有滨岛敦俊、森正夫、寺田隆信、林和生等多位学者致力于此。台湾、日本学者的这些研究,由于在语言上较易利用,很快就引起了大陆学者的关注。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刘石吉的三篇论文编成《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予以出版^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陆学者虽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曾有人发表过一些关于市镇研究的文章^⑥,但近年来关于市镇研究学术主流的形成,不能不承认是在一定程度上受海外学术思想影响所致。从80年代起,大陆出现了如樊树志、王家范、陈学文、傅宗文等不少致力于市镇研究的学者,他们凭借精通文献与熟悉实地情况的优势,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证研究等多方面,进一步增加了学术界有关市镇研究的成果积累。

当然,大陆学者致力于市镇问题的研究,除了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以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适应了中国近年来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发展。

自5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地区由于推行集体经济,集贸商业被纳入国家统购统销体系,政经合一的区社政府驻地取代了传统

市镇的地位,千余年来长期发展的农村市镇贸易衰退到历史的最低点。70年代初,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大城市工业的部分零配件等外围加工业转移到农村地区进行,开始出现所谓“社办企业”、“队办企业”。8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地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变,为了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农村地区劳动力过剩等问题,政府开始鼓励农村小型加工业的发展,从而在原有“社办企业”、“队办企业”的基础上,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乡镇企业”。与此同时,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被废止,农村地区商品流通开始活跃,市镇经济得以恢复发展。商贸活动与当地加工业的结合,不仅造就了农村地区许许多多规模庞大的经营现代工业品的专业市场,更使传统市镇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找到了新的发展支点,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在农村出现了无数个现代型的工业化小都市。农村地区的这一巨大变革,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从80年代初起,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以“小城镇大问题”为主题,连续发表文章^①,呼吁人们重视乡镇企业和农村小城镇建设问题。在费孝通的影响下,近十年来,在政府部门和有关学术机构已经形成了不止一个关于市镇问题的研究中心,积累了不少学术成果。

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向农村地区的渗透,市镇的传统人文景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陆农村市镇大多在80年代前期制订了城镇改造计划,开始有步骤地改建镇区,力图将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小都市。由于这种市镇建设往往是靠改造旧区即以拆旧建新的方式进行,由此常常引发保护传统人文景观与现代化建设之间严重的矛盾冲突。学者们在重视文化建设的呼吁每每被政治经济现实需要所忽视之余,更多地转向了以记录、整理传统市镇人文景观和历史资料为主的行之有效的研究工作。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政府部门也逐渐认识到农村市镇历史传统资源的某些现实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加入到文化建设的工作中。如当前全国正在普遍进行的地方志编修工作,也将某些重要市镇包括了进去。

旅游部门更是利用人们的怀古心理,努力发掘市镇传统人文景观的旅游资源。

迄今为止,关于农村市镇的研究已颇具规模,其涉及范围之广泛,论题之深入,非数十年前发轫之初可以比拟,几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尽管如此,学术研究总给人们留有进一步探索的余地。关于市镇尚未明确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它们在中国近代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处境、地位和作用。

大致讲,迄今为止从事市镇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这样三个领域。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早在30年代就已开始重视中国农村的研究。当时,由于世界经济危机、战火、自然灾害的影响等等原因,中国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曾有许多学者(包括部分西方学者)、学术机构,做了许多关于农村社会调查和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试图提出自己解决农村经济危机的办法。^⑧许多人在这种研究的过程中,曾或多或少地涉及过农村地区的市镇问题。所以,正如费孝通本人所言,80年代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这个论题,是他从前农村研究的继续。^⑨因此,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所主要关心的是现实的农村社会发展问题。他们研究当今农村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各地区发展的不同模式等等,就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从事学术探讨的同时,也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为一重要目的。关于市镇的经济学研究则更是这种现实研究在某一方面的深入或专门化,总之是以为现实服务为中心。目前各地政府咨询部门所从事的许多研究计划十分直接地反映了这一特点。

历史学界关于市镇的研究所涉及的时间范围相对宽泛。但近年来,或许是出于“中华帝国晚期都市化过程主要体现在市镇发展”这样的认识^⑩,或许是由于资料的局限,研究工作以明清时期(1368~1911)为主要关心点,无论是刘石吉、樊树志、王家范、陈学

文,还是滨岛敦俊、森正夫等人,都是如此。施坚雅在其开创性的论文中曾有一节专门论及市镇的近代转轨问题,并提出了至1948年,全中国大约有10%的中等市镇已通过现代交通的联系,被转变成现代商业中心的假设。^①可是数十年来,却极少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对这一假设作进一步的讨论。许多学者在论述明清市镇发展或其他方面时,曾附带地涉及了市镇的近代转轨问题,专题性的集中研究却很少见到。而且,已有的少量研究成果又几乎全都是从市场结构与经济功能的演变出发,来论述市镇的近代转轨问题,许多与社会演变关系甚大的其他方面,如人口、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状况等等,都少有涉及。

目前的研究状况留给了我们一个理论空缺。对于在1840~1949这百余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市镇在其中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它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了近代转轨的过程,我们所知甚少。解答这一问题,是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研究目的,还有如下两方面的基本考虑。

首先,市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存于农村经济上面”^②,是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的结果,许多学者的研究早已指出了这一点。因此反过来也可以说,市镇的盛衰可以作为农村社会变迁的指示器。具体就近代而言,例如当时西方经济势力对中国农村的影响究竟到了怎样的程度,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影响仅局限于通商口岸周边地区而已,内地广阔的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基本上未受到西方经济力量的破坏;另有一些学者却持基本相反的意见。分歧的起因大致并非在于学者们对社会变迁衡量标准取舍的不同,而是各自基于归纳的个案和角度的差异,或者说是由于基础性的个案研究工作尚不充分所致。从市镇变迁出发来探索近代农村的经济问题,似乎尚属比较新颖的角度,值得一试。

推而广之,市镇不仅仅在经济上与农村息息相关,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各方面都是如此。市镇是农村社会诸问题的集中指示器。近代农村社会在诸如生活方式、人口结构、文化变异、政治沿革等等各方面,都可以从市镇的变迁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虽说除个别例外,如宋代(960~1279)的市镇^⑧,历代政府在行政区划上都把市镇视同乡村,但市镇由于经济与人文活动的集聚,毕竟存在着不少与纯粹乡村不同的特点。从另一角度看,市镇又是都市与乡村的中介,乡村通过市镇与都市相联系,都市也从市镇这一渠道影响于乡村。所以,欲了解自西风东渐,近代文化和生活方式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市镇是一个绝好的切入点;欲了解中国近代的城镇化过程,市镇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

其次,社会发展是一种历史现象。这不仅说发展必然是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程,更主要地是指发展是前后的连续,是昨天与今天的连续。今天的发展必须以昨天的存在为基础。本书的撰稿者像中国所有其他学者一样,注视着当今农村地区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城镇化过程,因而对上述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针对当今农村现实的研究工作怀着极大的兴趣。同时,我们从自己专业知识的角度出发,又觉得现实研究如果在学术上缺少可供凭借的相应历史研究的积累,实在是一种遗憾。例如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农村地区市镇的复兴,我们虽然可以从乡镇企业发展、政府政策变化等许多方面来寻找它的原因,但如果不将这一问题与市镇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想要触及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真正内涵,恐有困难。在世界各国近代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多存在农村小市镇受工业化大都市影响而逐渐消失的现象,如日本与俄国都是如此。^⑨中国却不然,中国许多的农村市镇在其近代变迁过程中不仅并未消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繁荣了。当今市镇的复兴是近代这种发展趋势的继续。市镇的顽固存在,并非一时一地的政策、机遇所能解释,而必须深入了解长期以来决定中国农村社会结

构的各种因素,这就是一个历史的研究。又譬如,虽说历史不可能在相同的背景下重演,当今各地专业市场的发展,无论在经营结构、产品来源以及市场作用等方面,与历史上市镇专业市场的繁荣确有许多相近之处,因此在研究或规划当今各地专业市场的时候,了解历史上市镇专业市场的发生、演变乃至衰亡的规律,自然是十分必要的。可是迄今为止,这样的研究工作尚不多见。

我们如此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决非是在指责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们忽视了我们这个国家的过去,恰恰相反,是为了表示研究农村市镇近代变迁问题的迫切性,以及我们对此的责任感。

二、关于理论工具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中国农村市镇问题研究成果的积累,已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可贵的基础,尤其像加藤繁、费孝通、施坚雅等许多前辈的开拓性工作,对我们的研究更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使我们受益匪浅。又如最近颇受学术界关注的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也十分重要。黄宗智认为,长期以来,由于人口压力和资源缺乏,自明清以来的中国农村经济形成了密集型劳动力投入的生产结构,生产产品总量虽有增长,生产率却未见提高。这种生产结构的一个直接表现是农民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转向种植需要比粮食生产更多劳力投入的作物,从而获得比粮食生产相对多的收入。在江南,主要是棉布与蚕桑业。^④我们认为,明清时期本地区市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过密化生产结构造成的农业生产由粮食作物转向经济作物、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一结构在近代的继续维持,也必然会对当时市镇的演变产生影响。因此,细心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的许多地方发现我们受这一理论影响的痕迹。

但是就总体理论框架而言,本书主要关心的是中国农村市镇

的近代变迁问题。社会变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需要确立一定的理论规范来界定与衡量它。数百年来，理论界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关于社会发展进化的分析工具，从由经典大师所阐发的极其抽象的规律、模式，到当代学者偏重于技术层面的定性定量分析手段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的研究将择善而从，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借助其中某些有帮助的理论模式。不过在总体上，我们将首先借助的是现代化理论的分析工具。

本书的研究比较多地借用现代化理论，并不是因为“现代化”是一个时髦的词汇，或者它比较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口味，而是觉得它是最适合我们研究目的的理论手段。除了本书所界定的中国“近代”正是这一理论研究的时间范围的基本原因以外，现代化理论更主要地以其分析手段的综合性而受到我们的关注。社会变迁是一种全方位的运动，某一方面的些许变化都有可能预示着总体社会结构的异动。与此前一般侧重于某一具体角度的理论手段不同，主要从探索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而兴起的现代化理论，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两个目标：“第一，重点是经济发展的非经济环境；第二，考虑的不是现代化的独一性而是普遍性问题，即不同文化背景下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共同特征。”^⑧因此它涉及众多的学科，主要的例如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等等，是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理论。同时，相比于“革命”、“进化”等理论模式，着重研究自工业化以来社会变迁的现代化理论，在我们看来，较少价值判断和单线性阐述的意味，因而更加客观。

但由于现代化理论是近30年才兴起的新理论，尤其是它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的时间更短，在许多方面还很不成熟，未形成为多数学者认可的一致理论规范；又由于它上述的综合性，不同的学科都从自己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规定它的具体内容，所以对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还存在着不少歧异。在具体应用这一理论之

前,我们有必要首先阐明自己对这一理论的理解,或者说我们对不同理论倾向的态度。我们的这些理解,只是为了方便自己对特定论题的研究所作的具体界定,因而有时不免带有些许机会主义的味道。

“现代”一词就其本义而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有学者认为具体社会的“现代化”也必然是相对的,例如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有过蒸汽时代的现代化、电气时代的现代化和原子时代的现代化等。^⑩同样地,现代化理论结构功能学派的代表之一 G. E. 布莱克等人的研究小组,虽然认为现代化的起点来自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但同时又强调“现代化的过程将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⑪,所以很难说现代化的过程一旦开始,还将会有什么特定的时代含义。理论界定的相对性必然导致概念的混乱。我们倾向于罗荣渠的意见,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即“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⑫这一变革虽说至今尚未完成,在理论上讲,必有其时间下限。

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历史的习惯划分法,现代化与中国近代时期的社会变迁又不是一个完全对等的概念,现代化发动与近代史开端虽说在时间上一致,但现代化过程至今尚未结束,近代却早已是一个完成了的历史阶段。近代社会变迁可以说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中国学术界对英文 modernization 一词或译作“现代化”,或译作“近代化”,常常互用。在指近代社会变迁时,这两个词的互用尚不致造成混淆,但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则显然不能用“近代化”一词来概括。我们在描述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时,将坚持用“现代化”这个概念,而避免用“近代化”一词。

如上所述,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理论;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它的涵义作了不同的界说。各学科所描述的现代化过程的侧重面各有不同。例如从社会学衍生出来的现代化理论,根据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变迁论的基本理论架构,将现代化